

## 水戸学与陽明学

錢明

2012年至2015年，我非常有幸地全程參與了由德川齊正理事長，德川真木館長和徐興慶教授組織實施的“儒學閩連資料的調查研究”課題。四年來，在每年的七、八月間天氣最炎熱的季節，我們彙聚到德川博物館文庫<sup>i</sup>，查閱資料，拍攝照片，回國後再挑選出有價值的文獻，分門別類，撰寫釋文。如今呈現在諸位面前的這三冊圖錄釋解<sup>ii</sup>，就是我們這個團隊所取得的第一批成果。

德川博物館“儒學閩連資料的調查研究”項目，是通過國際合作的形式，對原藏於彰考館內的各類文獻史料進行系統調查，並選擇其中有價值的文獻進行圖錄釋解。這是繼水戸德川家15代當主德川國順先生在明治年間所作調查後的又一次系統調查，而且把所有調查成果向國內外作了首次公開展示。因此可以說，德川齊正理事長，德川真木館長和徐興慶教授組織領導的這一課題，是一項重大的國際文化項目，它對世人瞭解德川博物館及其前身水戸彰考館，瞭解儒家文化對東亞社會的影響，瞭解水戸學派的形成與發展，乃至瞭解江戶時期的日本思想文化史，都將產生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說是一項將被載入史冊的文化工程。

對於本場報告會，我原來打算從本人所撰的三十餘種文獻釋文中，挑選幾種較有價值的史料，就水戸學與舜水學的關係向諸位作一報告。但因時間關係，我想主要就《本館新撰》這本書及其所反映出的水戸學與陽明學的關係談點粗淺的看法，請諸位批評指正。

《本館新撰》，寫本，無序文，但文中有跋文，卷首有彰考館藏書印。據文中跋文，該書應是寬延三年（1750）秋山八兵衛、市川孫所編。從內容上看，該書應該是彰考館比較早的藏書目錄，其編纂時間則是在朱舜水去世（1682）後六十八年的寬延三年。

《本館新撰》中有撰於寬延三年午三月的跋文一篇，全文為“候文”，內容如下：

元來御目錄不立分，管庫口仲申候所。心覺迄二享保十三年申三月記置申候內。本日并御副本二相立可然分相撰申度旨，寬延三年午三月，管庫小田部茂介、鬼沢太衛門、惣裁增子幸八、河合伝次江及相談候處，尤之由二付，秋山八兵衛、市川孫之允相撰，朱点消之分ハ本日并御副本江出ス。

該書先是按子，丑，寅，卯，辰，巳，未，申，酉，戌，亥排列。其中辰部，記有《張非文筆語》壹本，《沈，張，蔣詩文》（筆語附）壹本，《霞池省庵手簡》壹本，《文苑雜纂》伍拾柒本，《舜水文集》參拾本等與明遺民有關的史料，並且在末尾補錄了《舜水文集草稿》二十四本。在其他部中，則記有《神道集成》貳拾伍本，《大日本史》貳佰伍拾本，《大日本史》（傍訓點）八拾本，《水城實錄》壹本，《近代諸士傳略》參拾玖本，《新補水城實錄》拾壹本，《水府系纂》拾壹本，《西行雜錄》壹本，《南行雜錄》伍本，《朱氏談綺》肆本，《韓使來聘日記》壹本，《西山紀聞》壹本，《大日本史論贊》八本等重要文獻。

然後是“靖伯樣禦遺本”<sup>iii</sup>，“朱文恭遺書”，“敕書箱之部”和“恭伯樣禦遺本”<sup>iv</sup>。

在“朱文恭（即朱舜水）遺書”中，共記有“《通鑒綱目》百拾本”，“《溫公通鑒》百肆本”，“《五經奇英》伍本”，“《詩經集傳》伍本”，“《國纂奇抄》陸本”，“《小學孝經》貳本”，“《左傳綱目》扒本”，“陸宣公集”肆本，“《難經》壹本”，“《廣皇輿考》拾貳本”，“《篇海》扒本”，“《管子》肆本”，“《古文品外錄》陸本”，“《禮記集說》扒本”，“《陽明文抄》伍本”，“《源流至論》扒本”，“《春秋左胡選》肆本”，“《說苑》三本”，“同肆本”，“《新序》壹本”，“同貳本”，“《韻府》拾本”，“《訓蒙圖彙》拾肆本”，“《孔子家語》本朝刻伍本”，“《敬齋箴》壹本”，“《關異》壹本”，“《詩韻輯要》壹本”，“《唐詩選》壹本”，“《日本史略》寫本壹本”，“《五經集注》拾伍

本”，“《名文珠璣》<sup>開本</sup>柒本”，“《古文奇賞》陸本”，“同三本”，“《元文韻》拾壹本”，“《太平廣記抄》三本”，“《詩經注》貳本”，“《禮記纂注》肆本”，“《武經》壹本”，“《讀史快編》三本”，“《周易本義》壹本”，“《續藏書》<sup>開本</sup>壹本”，“《文公家禮》壹本”，“《秦漢文抄》陸本”，“《編次諸家文集》三本”，“《武經標題正義》壹本”<sup>v</sup>，“《大學衍義補》壹本”，“《西陽搜古奇編》三本”，“《人物考》壹本”，“《必讀古文》壹本”，“《公穀管子纂》貳本”，“《古文纂》<sup>朱文恭手寫</sup>壹本”<sup>vi</sup>等四十八種中文古籍。

在“敕書箱之部”中，有《監國魯王敕書》壹軸，《文恭先生印石》五（枚），《安南行役紀事並節略》壹本，《先世緣繇履歷》壹軸，《奏疏貳首》（手書原本附，朱天正彰考館寫）壹軸，《揭，祭文貳首》（奏疏殘簡附）壹軸，《釋奠筆記》（文恭真跡）壹卷，《楠公贊》（朱文恭撰），《祭朱文恭文》（朱毓仁），《飛白文》（張斐文筆），《朱文恭先生畫像》（入箱）壹幅等與朱舜水相關的文獻原件。

在“恭伯樣遺遺本”後，有享保十三年（1728）三月記文，並有“禦目錄不立，分禦書物簿”的字樣。此後為一，二，三函目錄，系後人補錄，錄有《舜水文集草稿》三箱，《獨立真跡》壹冊，《義公禦真跡》四部，《常山文集》（箱入寫本）拾冊，《史館事蹟》壹冊，《大日本史草稿原本》貳佰伍拾冊，《十竹遺稿》（佐宗淳）壹冊，《魯齋遺稿》（今井小四郎）壹冊，《張斐墨蹟》二卷，《明冠服圖》壹軸等珍貴文獻。最後為寬延三年（1750）三月用日文草書撰寫的補記。

值得重視的是，在朱舜水所遺留的書目中出現了《陽明文抄》，《續藏書》等書籍。這有兩種可能：一種是這些書由朱舜水帶到日本，先供自己使用，然後留給彰考館。另一種是朱舜水到日本後尤其是抵江戶（京師）後購買的，如朱熹的《通鑒綱目》就是朱舜水在江戶購得的：“及來武江，方購得京師所錄《通鑒綱目》。”<sup>vii</sup>徐興慶先生認為，朱舜水在江戶購買《通鑒綱目》，無疑是想瞭解其被翻刻的情形。換言之，朱舜水自己原本有此書，到江戶後又從市面上購買此書，是為了瞭解此書在日本的翻刻情況。但可以肯定地說，朱舜水所用的儒家經典等書籍，大部分是從明國帶來的，即使《陽明文抄》，《續藏書》是朱舜水在日本購買的，也至少能說明他對此類書籍的極度興趣。

據筆者所知，現存《陽明文抄》的正式出版物，只有清張問達（江蘇江都人）編纂，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刊行的二十卷本，書前有張問達序<sup>viii</sup>。朱舜水逝於1682年，故其所遺《陽明文抄》肯定不會是張問達編纂本。由於朱舜水在1659年就已定居長崎，此時清國才剛剛定都北京不久，江南還處在戰亂之中，所以他帶到日本或是在日本購買的《陽明文抄》，當系明刻本無疑。而與“陽明文抄”類似的“陽明文錄”，“陽明文集”，“陽明文稿”等明刻本有幾十種之多，僅朱舜水的浙江同鄉所刻的本子就有十餘種，朱舜水所遺《陽明文抄》究竟是哪一種，現已難作判斷。當然還有一種可能，就是此《陽明文抄》是朱舜水本人或日本人之抄本，若如此，則更說明朱舜水對陽明著作的高度關注。

《續藏書》是晚明著名思想家李贄（1527-1602，號卓吾）編撰的史學著作，初刻於明萬曆三十九年（1611）。《續藏書》共有六十七卷，沒有《世紀》，只有《列傳》，記錄了自明興至萬曆年間四百多個人物，都是當代人物。

李贄是泰州學派的傳人，泰州學派屬陽明學派的分支，被稱為“左派王學”。李贄自幼偏強，善於獨立思考，不受程朱理學傳統觀念束縛，具有強烈的反傳統思想。《續藏書》表現出對下層民眾與達官貴人一視同仁的平等態度。書中不僅輯錄了王侯將相的事蹟，還有學士庶人，方外緇黃，庸僕妾妓等。對王侯將相並不一味褒揚，對下層民眾則有讚美之意。李贄的褒和貶，體現了“庶人可言貴，侯王可言賤”的平等歷史觀。

對“忠”的觀念，李贄也有自己獨到的看法。《續藏書》卷七《遜國名臣·程公·高公》篇裡，記載了編修程濟和禦史高翔不同的效忠法。程濟在“靖難”後，對建文帝說：“天數已定，唯有出走免難耳。”於是找來僧人為帝落髮，喬裝出逃，一直跟隨建文帝數十年。而高翔在“靖難”後，穿著喪服，大哭著去見燕王朱棣，出言不遜，觸怒朱棣，於是全家抄斬，沒收家產，親戚全部發戍邊疆，連祖墳都被挖開。對此，李贄評價說，高公以死為貴，程公以智免為貴，兩種忠好像不同。其實，高公死忠是忠，程公跟隨建文帝逃難也是忠，且程公之忠才是“人臣之大忠也”。李贄認為，忠與不忠，不在於追求死忠的名節，如果苟活着能為所忠之人或事謀取更大利益，才是真正的忠。

順便說一下，還有個張問達（?-1625），是陝西涇陽人，政治立場近於東林黨。這個張問達曾上疏彈劾李贄，說李贄刻《藏書》，《焚書》等作品，“流行海內，惑亂人心”，於是皇帝下旨，允許彈劾，並以“惑世誣民”的罪名下令逮捕李贄，其所著書亦遭焚毀。朱舜水對編刻《陽明文抄》的張問達未必知道，倒有可能熟悉這位張問達。

那麼，朱舜水為什麼要把《陽明文抄》，《續藏書》這類書帶在身邊，並留給彰考館呢？這可能與他的陽明學觀及歷史觀有一定關係，而這種陽明學觀及歷史觀又對水戶學派產生過影響。

對於朱舜水的陽明學觀，歷來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朱舜水推崇王陽明，並在日本傳播了陽明學，對此筆者已作了

否證；<sup>ix</sup>另一種認為朱舜水受到王陽明的感染，自覺不自覺地與陽明精神多有吻合。通過對朱舜水隨身攜帶的《陽明文抄》和《續藏書》的分析，可以看出這第二種看法基本能夠成立。其實，是否傳播陽明學與是否受到陽明精神的感染，是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依筆者之見，朱舜水不僅受過陽明思想的感染，而且對陽明的態度亦是崇奉勝於擔憂，讚賞多於批評。他批評的主要對象是陽明後學中的所謂“狂禪派”。在朱舜水看來，陽明之學“有病處”，即不是十全十美，而陽明後學中“狂禪派”則為“異端”<sup>x</sup>，應當徹底批判；一個是部分否定，一個則是全盤否定。李贄屬於陽明學派中的“狂禪派”，故而亦屬於朱舜水重點批判的對象之一。朱舜水選擇王陽明的文抄本即選集本，而不是全集本，其真實用意可能即在於此。

當然，朱舜水在消除王陽明之“病處”的同時，把王陽明一些非常正確的主張也清除了，比如在判斷是非的標準上，王陽明主張不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而朱舜水卻說：“來問朱，王之異，不當決於後人之臆斷，寒暖之向背，即當以孔子斷之。”<sup>xi</sup>“孔子之道，宜可萬世無弊矣。”<sup>xii</sup>認為“周孔之道”是絕對真理，因而是衡量學術是非的唯一標準。

儘管朱舜水對李贄等“狂禪派”持徹底批判之立場，但對於李贄的《續藏書》卻好像有部分的接受，尤其是其中的歷史觀。朱舜水與其同時代的另一位餘姚籍思想大師黃宗義一樣，讚賞“教人就事上理會”的永嘉之學，<sup>xiii</sup>而“事上理會”與王陽明所主張的“事上磨煉”在本質上是相通的，一個重視的是不能離開“事上”的認識（“理會”），一個重視的是不能離開“事上”的踐行（磨煉）。所以韓東育先生認為：“就大脈而言，朱舜水的‘實理實學’，實根據于‘周孔’聖人之道，而淺近的意義上說，實根據于‘浙東事功學派’。”<sup>xiv</sup>就歷史觀而言，永嘉學派與李贄，黃宗義等實有相同之處，即都比較重視現當代史的研究，注重現當代人物的臧否。因為只要按照“事上理會”的理念前行，就必然會把對上古史的興趣轉向現當代史，朱舜水的歷史觀亦復如此。而這種歷史觀對《大日本史》的編纂是產生過一定影響的，對此有必要作進一步的研究。

以上就是我對《本館新撰》這本書以及水戶學與陽明學之關係的一些粗淺看法。

- 
- i 德川博物館的前身是水戶藩藩主德川光圀所建的主要進行修史的彰考館，被譽為日本之《史記》的《大日本史》，就是在彰考館編纂完成的。
  - ii 即《日本德川博物館藏品錄》I《朱舜水文獻釋解》，II《德川光圀文獻釋解》，III《水戶藩內外關係文獻釋解》，德川真木監修，徐興慶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日本德川博物館2013年6月，2014年6月，2015年6月出版。
  - iii 靖伯即德川綱方（1648-1670），光圀姪子，後以養子身份被立為水戶藩世子，早亡。
  - iv 恭伯即光圀養子德川綱條（1656-1718），小名采女，號鳳山，綱方死後被立為世子，水戶藩第三代藩主，諡號恭伯。實為光圀親兄長賴重的次子。
  - v 《新鐫武經標題正義》是中國武學典籍，全七卷，明趙光裕注釋並校正，萬曆十六年（1588）刻本。此書附鐫《武經節要》一卷，附陣法，馬步射法，棍法一卷。
  - vi 此書疑是朱舜水為教授日本弟子而親自編纂的古文範文。
  - vii 安積覺：《朱文恭遺事》，收入朱謙之編校：《朱舜水集》下冊，中華書局，1981年，第625-626頁。
  - viii 全名為《王陽明先生文鈔》，二十卷，清張問達輯，清康熙二十八年致和堂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49-50冊收錄。
  - ix 參見拙文《近世東亞文明與朱舜水之位相》，徐興慶主編：《朱舜水與近世日本儒學的發展》，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年，第80-98頁。
  - x 《朱舜水集》上冊，第296頁。
  - xi 《朱舜水集》上冊，第84頁。
  - xii 《朱舜水集》上冊，第84-85頁。
  - xiii 《黃宗義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5冊，第56-57頁。
  - xiv 韓東育：《從“脫儒”到“脫亞”》，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2年，第254頁。